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方 言 · 方 言 學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方 言 · 方 言 學

阿 瓦 涅 梭 夫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1566

音·方言學

者：阿 瓦 涅 梭 夫

者：高 名 凱 彭 楚 南

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9,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35,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800元

方言

方言源出希臘語 *dialectos* ——「土話」，「地方話」。地方或地域方言是全民語言的分支，是某個部落、部族或民族的一部分成員所說的語言。它流行在只為這一部分成員所佔據的地域裏。它隸屬於整個部落或部族的統一的共通的語言。

「地方（『地域』）方言，是替人民羣衆服務，並且有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爲民族語言的基礎並發展爲獨立的民族語言。」（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三——四四頁）

「也有相反的發展過程：一個部族由於缺乏必要的經濟發展條件而還未成爲民族，它的統一的語言因爲國家崩潰便瓦解了，至於還沒有在統一的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躍起來並成爲形成單獨立語言的基礎。」（同上書，第四四頁）斯大林的這一指示非常重要。應用這些指示的語言史學家們就能够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各種不同

的民族語言形成的極端複雜的問題。

必須區別地方方言和「階級」習慣語或同行語之間的差別。「階級」習慣語或同行語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斯大林指示說，「階級」習慣語，正確些說，應當叫做同行語，並非替人民羣衆服務，而是替狹小的社會上層服務的。此外，它們沒有自己本身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因此，它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展爲獨立的語言。

語言分化爲方言，是許多世紀的全部人民歷史所決定的，這種方言分化往往是複雜而多樣化的。因此，在俄羅斯語言學的文獻裏，除了「方言」(диалект)這個術語之外，同時還應用了「地方話」(наречие)和「土話」(говор)這兩個術語。地方話是由一羣大體上相近而相互間有個別差異的土話組成的。兩種或幾種地方話構成某種語言。這樣一來，土話彼此之間要比地方話彼此之間更爲接近。同時，土話通行的地域單位要比地方話來得小。在語言學的文獻裏，也應用「次地方話」(поднаречие)、「次土話」(подговор)兩個術語，它們的意義和在語言的方言分化裏所佔的地位，可以從它們的名稱裏明顯地看出來。

「方言」這個術語在普通語言學裏指的是語言的地方變體，不論它所指的概念的範

圍怎樣。在俄羅斯的科學傳統裏，「方言」這個術語既用於它的廣義——「地方話」，又用於它的狹義——「土語」。在蘇維埃的語言學裏，當研究具體的語言史時，方言所指的觀念，在範圍上通常是居於地方話和土語兩個概念之間（例如，試比較，南部大俄羅斯地方話，梁贊方言，地區的或居民點的土語）。這些概念是相對的，它們在個別的語言史裏才具有具體的內容。

在某些情形之下，分別方言和語言是有一些困難的。與語言相反，方言總是語言的分支，是社會裏一部分說這種話的人所特有的。方言以它的個別的特殊特徵區別於該語言的一般特徵。在這一方面，方言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徵之間（換言之，即方言中的全民因素和地方因素之間）的關係有時是極端地不同，是該語言的歷史所決定的。例如，俄羅斯語言的諸方言在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上相互間非常接近，相反地，德意志語言或意大利語言的諸方言，彼此之間却有相當大的差別。

上面說過，替人民羣衆服務的地方方言有它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從一個語言來源產生出來的親屬方言，總不會在全部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上彼此不相同，而只是在某些成分上有差別。方言的差別能夠存在於語言的一切方面。

包括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例如，試比較，俄羅斯諸方言在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方面彼此之間的差別“у меня——у мене 我有，печѣшь——пекѣшь——пекюшь 你烤，у сестры——у сестре 姊妹有，на горе——на горы 在山上，нести——несть 攜帶，печь——пекча——печить，косить траву——косить трава 割草，петух——петух 公雞，пахать——орать 耕種，волосы——вѣски 頭髮，тропинка——стѣжка 小路，песни петь——песни играть 唱歌）。在一些歷史條件之下，方言差異經過一個時期，可能擴大到在不同的方言的基礎上發展為不同的語言；在另一些歷史條件之下，相反地，不同的方言可能接近起來，統一在一個全民的語言裏。由於這一切原因，彼此間能了解或不能了解，不能作為劃分語言和方言的界限的標誌。比方說，現代的民族語言如俄羅斯語、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比起德意志語言的諸方言來，按其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來說，彼此之間要接近得多；雖然如此，前者是不同的語言，而後者却仍然是一種語言的諸方言。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看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接近程度，也要看歷史性質的原因——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由於這些原因，前者的使用者結果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白俄羅斯民族），而後者的使用者却成了一個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員。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言學說是建築在斯大林論語言的原理的基礎上的；這一原理就是：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不屬於上層建築之列，它沒有階級性，而在它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都是全民的，它根據它的內部發展規律變化，這種變化是通過新質要素長期的逐漸積累和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是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出來的產物——從斯大林的這一原理出發，任何現代的語言和它的方言都應當被視爲是它們所經過的全部複雜的歷史道路的結果。語言的地方變體——方言——可以溯源於不同的，往往是非常遙遠的古代，它們隨着社會的歷史，隨着該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人民——的歷史，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

現代的諸語言和諸方言是在複雜的過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是語言的分化，另一方面是語言的統一。分化過程在語言歷史的最古時期裏佔優勢。所以，原始公社制度時代，語言的特點就是大量的親屬的部落語言存在，它們有共同的來源，在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上是互相接近的。後來，語言的統一過程就獲得日益重大的意義。比方說，在封建割據時代，在個別封建領地上有許多獨立的半國家，其方言最初往往是分歧的，逐漸在每一領地上各自形成日益統一的方言；同時，各封建領地的方言繼續在語言方面分歧下

去，產生了更新的方言差異。這樣一來，語言的統一和分化同時發生，但是却在不同的範圍內發生。封建主義時代裏，不同區域內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同時它們的方言（部族的統一的語言的變體）的獨立性也是相對的。斯大林教導說，部落和部族「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佔着統治地位，並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同上書，第九——十頁）。

部族語言的全民因素和地方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特點，在不同的部族裏，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可能是不相同的。一般的情形是，在資本主義之前的時期裏，方言的特徵是有很大的穩固性，同時，在外沿地區，新的方言差異往往繼續發展起來。但是，總的來說，部族語言中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共同點，在這部族的進一步發展中，通常是逐漸擴大。比方說，在俄羅斯語言的歷史裏（十四——十六世紀）可以指出一系列的現象，它們發生在中部和東北部，證明俄羅斯（大俄羅斯）部族的發展着的語言的共同點；但是這些現象却並不發生在西部和西南部，那裏大約在同時形成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部族及它們的語言（試比較，俄羅斯語的 *МОЮ* 我洗，*ЕГО* 脖子，白俄羅斯語的 *МЯЮ*, *ЕЯЮ*）。

烏克蘭語的 *мию, шир'*，陽性名詞複數主格 *городя* 城市，*дома* 房子，*леса* 樹林，重音在 *о* 的形式是白俄羅斯語和烏克蘭語所沒有的，等等）。

親屬方言的分化和統一引起方言差異的形成的基本過程。方言差異也可以由非親屬語言的交配形成。但是應當記住斯大林的指示，即兩種語言交配的結果，不能夠產生本質上不同於其中任何一種語言的新的第三種語言。「實際上，在兩種語言交配的時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種成爲勝利者，保存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繼續按其內部發展的規律發展着，另一種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同上書，第二八頁）如果交配發生在勝利的語言的一部分地域裏，那末，勝利的語言一面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下去，一面也能够在某種程度上保存失敗的語言的個別特徵，或者在這些特徵的基礎上呈現的一些特點，而這些特徵或特點就獲得方言差異的性質。比方說，北部大俄羅斯方言的 *口化*——*口音* 和 *口音* 的相混（*чайка* 唸 *чайка* 茶杯，*чѣбо* 唸 *чѣбо* 什麼的）——的產生，大約就是俄羅斯語言和東歐的烏戈爾——芬蘭諸語言交配的結果；同樣地，西伯利亞的俄羅斯諸方言的某些特點，也就是由於俄羅斯語言和西伯利亞人民的諸語言交配的結果。

在一直沒有居民的新地區上殖民，或者在有其他說別種語言的人民居住的新地區上

殖民，也能够引起方言差異的形成。在新近殖民的地域裏，方言的發展具有極其特殊的形式，而以具體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地理因素（例如水路之有無，山脈、叢林、沼地對各地區的阻隔等等）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對方言差異的形成有顯著的意義。

在語言分化過程正是活躍的能產的時代裏，方言籠罩着整個地域。不但前階級社會是這樣，封建制度時代的階級社會也是這樣，因為語言在它發展的一切階段裏，對於社會的全體成員是統一的共同的。所以，在這一或那一個封建領土或公國的境界裏，無論是封建剝削者或是被剝削的平民，都一樣說着同一方言。當然，他們的語言也有一些差別，這可以用他們在階級社會中生活條件的不同來解釋；然而這些差別多半是在於某些特殊的詞、詞藻和語氣，而沒有涉及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例如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葉的俄羅斯地主貴族所說的話的口語材料，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話，主要可以從保存下來的私人通信來斷定。

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民族的形成促成全民族共通的民族語言的最後的形成，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的學說，「民族的共同體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載「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

二卷，第二九二頁）。在民族語言即整個民族的語言裏，有文學語言（正確些說，民族語言的文學加工的形式），也有各種各樣的民間口頭語和方言。方言在資本主義時代裏已經帶有殘餘的性質。這時期，語言分化過程已經讓位於語言統一過程和方言集中為統一的民族語言的消磨過程。方言的差異照例已經不再出現，現存的一部分則隨着時間開始消失。民族語言的文學加工的形式是在全民口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逐漸地對方言發生日益增長的影響，逐漸排擠方言，只有鄉村的居民——農民——還繼續使用方言。在這裏，文學語言和方言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單方面的影響，而是複雜的相互作用，在這種作用的過程當中，文學語言一方面影響方言口語，同時自己也不斷地充實起來。

但是，一方面由於千百年來所創立的語言特徵的穩固性，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矛盾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在資本主義時代裏方言差異的消失往往是慢慢地發生的，同時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地域裏是極不平衡的。只有正在消滅城鄉對立、走上全體人民的強大的文化高潮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够保證民族語言的文學加工形式完全排擠方言口語。

方言學

方言學（源出希臘語 *dialexis*——土語，地方話和 *logos*——詞，學問）是語言學的一個部門，是研究某種語言的方言的。在蘇維埃的語言學裏，歷史方言學有特殊的意義。根據斯大林的學說，民族語言是在某些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它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頁）所產生的，是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同上書，第二四頁）。歷史方言學的任务就在於研究某種語言的形成過程，這種語言在它的全部發展階段裏，「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同上書，第九頁），都是全民的。所以歷史方言學是研究語言歷史的重要補助學科。方言圖表學可以給某種語言的諸方言的語音系統、語法構造和詞彙以系統化的知識。

方言學是跟人種學密切地聯系着而發展的，因為方言和方言的特徵是極其重要的人種學標誌。在蘇聯境外各國的學術界裏，直到如今，方言學在頗大的程度上還是人種學的附屬品。在蘇維埃語言學裏，它近來已經日益明確地成爲研究民族語言的各種民間方言分支的名副其實的語言學學科。

斯大林教導說，方言有它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全民的民族語言是統一的，雖然成爲它的分支的方言仍舊存在。由此可見，方言學有必要朝着一定的方向進一步發展。斯大林又教導說，語言不斷向前發展，並按其內部的發展規律改善自己，研究這種規律，是語言學的主要任務；由此可見，把每一種方言當做完整的語言系統來詳細研究，並把民族語言整個地來加以詳細的研究，是必要的。

語言的方言分裂的事實是人們早就知道的；古代的修辭學家和語法學家已經使用了這些術語：卑語、地方主義、語法錯誤。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紀爲止，方言的現象還只被認爲是正確語言的「謬誤」和「歪曲」。只有在十九世紀初葉，在西歐和俄羅斯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條件之下，人們對於民間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人種學和民俗學的興趣都增加了，因此也對民間語言發生了興趣，開始在民間語言裏看到由於各種各樣的歪

曲而在書面的文學語言中消失了的語言的「素來的純潔性」。作爲獨立學科的方言學產生了，雖然它還沒有完全脫離人種學和民俗學的範圍。方言學的繼續發展和語言學裏「年青語法學派」思潮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年青語法學派除了運用書面文獻的材料之外，首先廣泛地運用活的方言材料，來對親屬方言和親屬語言的某一語系進行歷史比較研究。但是，他們把方言看成是曾經存在過的語言整體瓦解的產物，是具有精確的分界綫的地理上閉塞的語言單位，這語言單位具有隣近地域的方言所沒有的有一定的語言現象作爲它的特徵。這種觀點是反歷史主義的。它沒有考慮到現代的方言不是以它的原始狀態留傳給我們的，沒有考慮到它們是許多世紀的長期發展的產物，在這發展裏，每一個接踵而來的歷史時代對它們都有所貢獻。大家知道，有一些時代，方言分裂了，這樣就產生了更新的方言差異；相反地，另外有一些時代，它們統一起來了，而原有的方言差異消失了。斯大林教導說，「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同上書，第二〇頁）。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紀初葉，由於實際材料的累積和個別方言事實的地域分佈的研究，所謂「語言地理學」發展起來了。外國的語言地

理學以它的最近的代表人物（法國的齊列龍——*Жильрод*）爲首，否認方言本身的存在，否認它們之間的界限的存在，否認語言規律，否認多少貫徹在方言裏的語音系統和語法系統的存在。結果，他就拒絕研究方言的語言系統，宣稱個別的詞才是語言的唯一現實。外國的語言地理學的代表們做過不少實際材料的研究，但是他們完全拒絕把語言結構作爲完整的系統來研究，同時在頗大的程度上拒絕研究民族語言形成的歷史條件性。

在俄羅斯方言學的領域裏，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波鐵布尼亞（*А. А. Порешня*）、蘇保列夫斯基（*А. И. Соболевский*），和沙哈馬托夫（*А. А. Шамагов*）——特別是後者，都曾經做過很多的工作。

在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問世之前，馬爾和他的繼承者們給方言學諸問題帶來了許多混亂。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馬爾的擁護者們企圖把適應於所謂「語言新學說」的西歐的語言地理學的原理，特別是齊列龍的法蘭西學派的原理移植到蘇維埃語言學中來。他們跟齊列龍學派一樣，否認語音規律，語法系統，只拿個別的單詞的研究來代替這一切。他們不承認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認爲語言的交配是質量上新的語言和

方言的發展中的基本過程；他們認為民族語言是虛構，實際上存在的只有階級的語言。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奠基者的著作裏有關於方言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探討。其中應當舉出恩格斯的著作「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及「福蘭克方言」。語言學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在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裏得到了解決，這部著作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的一個卓越的貢獻。在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和他論民族問題的經典著作裏可以找到作為蘇維埃方言學基礎的、關於語言和方言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蘇維埃方言學家正集中力量來編製俄羅斯語言的方言地圖集。莫斯科以東的中部地區的俄羅斯土話地圖集已經繪製完竣了。在蘇聯科學院領導下進行的這項土話地圖繪製工作有大學和師範學院的許多教師、大學生和研究生集體參加。在蘇聯，語言地理學的工作完全是建立在斯大林語言學說的天才原理的基礎上的。蘇維埃的方言學家非常注意寫作專門討論個別方言的專題論文。在研究多語言的蘇維埃各民族的方言方面，正進行大量的工作。